

从悲剧的他者到独立的勇士

——论《卖花女》中伊莉莎的蜕变

李希梦

(东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沈阳 110819)

摘要:乔治·伯纳德·萧是继莎士比亚之后最负盛名的英国剧作家,他继承和发扬了亨利克·易卜生开创的真实反映社会现实、揭露社会痼疾的优良传统,创作了大量批判现实的社会问题剧,《卖花女》便是其中的优秀作品之一。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理论视角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底层女性被边缘化、他者化、异化。《卖花女》中的女主人公伊莉莎经历了权力压迫下的身体和话语的双重规训,被消解了行动和话语的自主支配权。然而,反抗与规训是共生的,伊莉莎最终顿悟觉醒,勇敢地反抗资产阶级的权力控制和压迫,实现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解放。

关键词:卖花女;伊莉莎;规训与惩罚;权力理论

中图分类号:I561.0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4)02-0082-06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4.02.011

From Tragic Other to Independent Hero: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liza in *Pygmalion*

LI Ximeng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Abstract: George Bernard Shaw, a renowned British playwright following Shakespeare, inherited and promoted the fine tradition of realistically reflecting social reality and exposing social ills initiated by Henrik Ibsen. He created numerous social issue plays critiquing reality, with *Pygmalion* being one of his outstanding works. Through Michel Foucault's power theory, lower-class women in capitalist society are often marginalized, othered, and alienated. In *Pygmalion*, the protagonist Eliza undergoes dual discipline of power on her body and discourse, losing autonomy in action and discourse. However, resistance and discipline often coexist, and Eliza eventually awakens, bravely resisting the power control and oppression of the bourgeoisie, achieving dual liberation of body and spirit.

Key Words: *Pygmalion*; Eliza; Discipline and Punish; power theory

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乔治·伯纳德·萧(George Bernard Shaw)(通常译作萧伯纳)是20世纪英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剧作家,一

生共创作戏剧51部,剧作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萧伯纳深受“现代戏剧之父”亨利克·易卜生的影响,格外关注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卖

作者简介:李希梦(1999—),女,河北唐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花女》(*Pygmalion*)又译作《皮格马利翁》，是萧伯纳的优秀剧作之一，一经问世便引起了世界瞩目。国内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主要集中在女性主义、神话原型、人物形象、跨文本研究以及翻译和语言学等领域。然而，目前鲜少有学者运用福柯的权力理论对《卖花女》进行系统性的深入研究，大多是将权力理论结合语言学方法或其他理论对其进行分析。Pirnajmuddin 等阐明了《卖花女》中语言学和福柯权力话语概念的交集，“揭示了教育与阶级话语之间的关系”^[1]；Kuhi 等选取了几个语言要素来计算分析“息金斯和伊莉莎的对话中展现的权力关系的变化”^[2]；吕曰文将权力理论结合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分析认为“《卖花女》批判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最终伊莉莎的自我消匿在了父权社会的规范之中”^[3]。

《卖花女》源自古罗马奥维德《变形记》中塞浦路斯国王皮格马利翁雕刻的象牙变少女的神话，无论是古希腊神话里雕刻理想少女的皮格马利翁，还是通过身体与话语的双重规训将社会底层卖花女改造为贵族女性的息金斯教授，他们创造者与主导者的身份不言而喻。而社会底层女性作为上流社会男性对理想女性的愿望投射对象，一直是一种被物化、被凝视、被规训、被改造的存在。然而，幸运的是，伊莉莎最终实现了灵魂的觉醒，凭借勇敢与独立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控制与束缚，从一个悲剧的他者成长为独立的勇士，完成了自身的蜕变。

一、福柯的权力理论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作为一位权力理论家被广为人知，他分析了几种不同的权力类型，包括“君主权力、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4]。他在著作《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中对规训权力作出了最负盛名和最细致入微的阐述，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福柯认为，权力不仅在宏观的政治层面无孔不入，而且会对微观层面的“修道院、监狱、学校、兵团”^{[5]337}等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认为，权力时时刻刻对囚犯实施凝视和监督，由此使他们逐渐适应高压的规训环境；由权力产生的控制是一种权力话语、一种

意识形态压抑、一种权力摄控的象征。在息金斯的温波街别墅里，伊莉莎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她不仅要听从息金斯的命令，每天进行高强度的语言、对话和姿态等各方面的训练，甚至还要听从息金斯的女管家别斯太太的调遣，为其分担诸如为息金斯寻找个人物品和记录约会安排等她不愿承担的繁杂工作。另一位语言学家——息金斯的朋友辟克林，虽然对待伊莉莎较为礼貌客气，但也全程参与了对她的控制和规训，并且乐在其中。

“全景敞视主义”是福柯权力理论的核心之一，其目的是使知识“批准权力的行使，并使其合法化”^[6]。这一理论来源于 18 世纪边沁所构想的“全景敞视监狱”，其结构为“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5]224}。在全景敞视监狱中，监视者手握由上层阶级话语体系构建起的权力，拥有主导权和对被监视者绝对的支配权。温波街别墅构成了规训机制的一种微缩模式，一种高效的人体监视系统。在全景敞视的温波街别墅中，监视者息金斯处于环形建筑的中心位置，具有阶级属性的层级监视和规范化裁决作为两种规训手段共同构成了这一狭小空间内的基本权力运行制度。全景敞视监狱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即使瞭望塔中空无一人，被监视者也会想当然地认为窗帘后仍有人在暗中偷窥与监视。上层阶级由此对下层阶级施加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使他们时刻保持警惕并将这种压力内化为自我监视的动力。所以，即使是在别墅外，伊莉莎在社会中的处境也如同身处全景敞视监狱之中的囚犯，在凝视中处于一种压抑的生活状态。希腊神话中的雕像少女在觉醒前也是无时无刻不被凝视，因其没有生命，所以连躲避、选择的权力都没有。而卖花女伊莉莎则是受无意识的驱使，亲手将自己送入了“监狱”。

“除了监视功能，全景敞视建筑还是一个实验室。它可以被当作一个进行实验、改造行为、规训人的机构。”^{[5]228}住进温波街别墅以后，伊莉莎每天在众人面前都要保持“公爵夫人”的姿

态，不仅受到别墅中所有人的凝视，而且还要四处参加宴会训练，接受各种身份地位的人的凝视；即使在独自一人时，伊莉莎也难以卸下面具，因为权力“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5]226}，她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凝视下无处遁形。最后，在外国大使馆的宴会上，伊莉莎更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对外国大使和大使夫人、翻译官、贵族等上流阶层的凝视，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由内在无意识的自我监视和外在社会阶级观念组成的双重权力体的操控之下，权力对伊莉莎施加了双重规训。从人物的身体到话语，从思考方式到行为模式，权力逐渐消解了主体对自我的自主支配权，权力规训也使伊莉莎发生了自我异化、劳动异化和社会关系的异化。

二、权力的规训与控制：悲剧的他者

福柯认为，家庭是考虑规训问题的最佳起点。在家庭的原初权力体中，父母往往是真理和权力的代表，对子女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和掌控权。伊莉莎的父亲杜立特尔是一个以倒垃圾为生的无赖，不仅经常不知其踪，而且“从没管教过伊莉莎，就是有时候抽她一顿皮鞭子”^{[7]103}。拒绝接受规训的个体所面临的直接后果就是受到惩罚。伊莉莎的第六个继母将她赶出了家门，所以她只能住在一间窄小简陋的地下室里，以在街头卖花为生。此时的伊莉莎虽然远离了家庭的规训，但在生活的窘境下，她主动接受了语音学家息金斯教授对其身体和话语的双重规训。

（一）权力对身体的规训

福柯将人看作机器，认为规训是操控身体的政治技术，他指出：“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肉体是驯顺的，可以被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5]154}息金斯也将伊莉莎看作是没有情感的机器和实验品，他冷漠地询问：“伊莉莎，你有自尊心吗？”^{[7]89}他高高在上，对社会底层贫苦人民不屑一顾。规训权力以身体为目标，将个体塑造为驯顺而高效的“单向度”造物。息金斯从外表和体态两方面对伊莉莎进行了身体

规训。

特定的人群具有某些符号，所以可以被一眼辨认出来。伊莉莎从头到脚透着底层人民的特征，想要移除这种明显的特征，就要对伊莉莎的外表进行改造。首先是个人卫生。由于从小生活在贫民窟，缺乏父母的教导，伊莉莎连最基本的个人卫生习惯都不具备，她直接将衣袖当作抹布随意擦拭。息金斯将自己的手帕送给伊莉莎擦眼泪，教给她作为一名花店店员应该遵守的基本规则。此外，伊莉莎自出生以来从未洗过澡，因为穷人的生活条件恶劣，洗澡对于他们来说不仅奢侈而且极易着凉，一旦感染风寒则可能致命。不仅如此，伊莉莎甚至晚上也是和衣而睡，别斯太太教会了她如何洗澡和换睡衣休息。其次是衣着。她“戴着一顶黑色的水手小草帽，早就沾满了伦敦的尘土和煤烟，大概从来也没有刷过。她的头发也很该洗洗了，那像个灰老鼠似的颜色绝不会是天然的”^{[7]70}。这是典型的底层阶级贫苦人民的装扮，在上层阶级的贵族看来简直啼笑皆非。然而，在息金斯的改造下，伊莉莎先是被打扮成了一位连她的亲生父亲都未能认出的秀丽而极其整洁的日本少女，随后又在息金斯母亲的小型会客厅中身着华丽的服饰亮相，最后在伦敦的外国大使馆惊艳众人。伊莉莎不仅穿衣品味有了提高，审美水平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华丽的衣着仅仅掩盖了伊莉莎肤浅的表层问题，无法根除其与生俱来的底层阶级人民的习气，还不足以使她完美地扮演“公爵夫人”。因此，在完成外表的改造后，息金斯教授开始对伊莉莎进行仪态举止的规训。

“体态可以逐渐矫正。一种精心计算的强制力慢慢通过人体的各个部位，控制着人体，使之变得柔韧敏捷。这种强制不知不觉地变成习惯性动作。”^{[5]153}息金斯对伊莉莎的体态进行了严格的规训，伊莉莎不仅需要在家里时刻训练，还要出席各种聚会、展览、音乐会等进行实战演练。反复高强度的训练形成了肌肉记忆，最终使她在大使馆的宴会中脱颖而出。伊莉莎的身体是“被操纵、被塑造、被规训的。它服从，配

合,变得灵巧、强壮”^{[5]154}。正如法国杰出的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言:“女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8]伊莉莎就如同被创造出的雕像少女,是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加工出来的产品,也是资产阶级眼中的他者。

(二) 权力对话语的规训

话语不仅仅是语言,而且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在大多数现代社会中,社会精英阶层的口音在公共场合被用作‘合法’语言,而其他方言及其使用者与标准语言相比被认定为是可耻的。”^[1]息金斯认为,在盛产暴发户的时代,一夜暴富的人虽然依托财富而尽享功成名就,却难以真正跻身上流社会,因为他们一张嘴就会露出马脚,生活环境赋予底层人民的土音仅凭一己之力往往极难消除。颇负盛名的美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性别研究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曾在其著作《消解性别》中指出,“在话语的层面上,某些生命完全没有被当成是生命,这些生命没有被人化,他们不能被放到主流的人的框架中来”^{[9]25},而这些生命“因为使用了那样的语言,身处那样的语境,只能将自己作为被绑在一起的人来呈现,这个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9]20}。在 19 世纪末的英国,话语对于人们来说不仅仅代表着掌握知识和拥有真理,同时也象征着绝对的权力和至高的地位,标准的语言逐渐演变为上流社会的标志,甚至是他们更为隐蔽的统治工具。

从伊莉莎的话语来看,首先,她的词汇单调贫瘠。在实验前,她只会反复使用“正经人家的女孩子”来为自己辩白;其次,她就像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婴儿甚至是未开化的野兽一般,只会尖叫或者发出“哎——呀——呀”的噪声来表达自己的各种情绪;最后,她的土音浓重,不仅无法进入要求口音纯正的花店上班,甚至被息金斯批评说“一个说话口音那么难听的女人,在哪儿也不能待,根本就不该活着”^{[7]76}。伊莉莎的话语决定了她注定要处于社会底层群体之中,正因如此,息金斯才答应做这个在外人看来近乎天方夜谭的实验以证明自己是“当代最伟

大的语音学家”。于是,息金斯和辟克林以伊莉莎为赌注和实验品,对其进行了长达六个月的话语规训。

息金斯对伊莉莎的话语规训主要从语音语调、话语内容和情绪管理三个维度进行。首先是语音语调。伊莉莎经过了反复练习、高强度训练、固化发音习惯三个层面的规训。息金斯让伊莉莎像咿呀学语的婴儿那般反复背诵字母表,连续六个月进行高强度的课上训练,从而使伊莉莎的发音器官形成记忆,实现肉体的驯顺性。由此,伊莉莎才能有从“爱,拜,赛,戴”等浓重地方口音到“A,B,C,D”等标准读音的转变。其次是话语内容。为了掩饰身份,伊莉莎只被允许谈论两方面的话题:天气和健康。最后是情绪管理,这也是话语规训中的重要部分。只有保持平和的心态、时刻伪装自己,伊莉莎才能成功混迹于贵族群体之中。在伊莉莎还是街头卖花女时,她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稍有不顺便大哭大闹、大喊大叫,丝毫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和周围人的看法。但是在戏剧的最后一幕,任何事情都不能再激怒伊莉莎。辟克林让她骂人来发泄情绪时,她说:“我做不来。从前我可以骂人;可是现在做不来了。”^{[7]143}在外人面前,她能立刻变得沉着文雅。即使对息金斯有着无限的怨怒与不满,她也“和和气气的,态度从容,做出非常自然的样子。她拿着一个小针线篮子,态度安闲自若”^{[7]141}。她的平和安静与息金斯的暴虐冲动形成了鲜明对比,讽刺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虚伪。然而,伊莉莎的改变仅仅是表面的、肤浅的,她依靠隐藏自己的缺点来融入上层阶级使其并未真正地实现阶级跨越。这种改变是虚假的、暂时的,伊莉莎只有遵守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规范和话语准则,才能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得到上层阶级的认可。

六个月的规训结束后,伊莉莎的“结业考试”随之而来,“考试标志着一个学徒期的结束”^{[5]210}。“检查显示了被视为客体对象的人的被征服和被征服者的对象化”^{[5]208},检查带来权力的可见性行使,将对象客体化,进而控制他

们。伊莉莎作为息金斯亲手打造的完美作品，被他带到外国大使馆的宴会上炫耀展示。“在现代规训时代，被看意味着被剥夺权力，可见性则标志着屈从于检查的目光。”^{[10]123}伊莉莎在宴会中谈笑风生，再不复往日的窘迫，但同时她已经被资产阶级同质化。伊莉莎的衣着、话语、姿态等与上层阶级别无二致，她被大家认定为匈牙利公主，是与他们一样的贵族。检查能够让受众对象和权力阶层不断地认识自身，实现越发精准的自我定位，从而带来社会的规训。六个月前，伊莉莎为了逆转自己的人生，主动找到息金斯教授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规训，进而完成了从卖花女到“公爵夫人”的转变。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伊莉莎始终处于从属地位，话语权和身体主导权的缺失使她的主体意识和内心诉求从未得到过真正的关注，她永远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悲剧的他者。

三、权力的争夺与消解：独立的勇士

“在现代规训体系中，我们可以说，被标记为拥有一个身份，是权力被剥夺的一个特征。”^{[10]126—127}在皮格马利翁的神话中，象牙被雕刻为美丽的雕像，雕像又被赋予生命变成少女，这是从死到生的质的飞跃。我们无从得知雕像少女是否能成长为一个拥有独立意志的女性，但《卖花女》中的伊莉莎在被资产阶级规训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上层阶级的虚伪和浅薄，最终，她从一个边缘化的他者成长为敢于追寻梦想的独立勇士。

（一）伊莉莎灵魂的觉醒

在息金斯的规训下，街头卖花女伊莉莎被塑造成为一位上流社会语音纯正、仪态端庄的“公爵夫人”。伊莉莎始终明白自己所得到的一切只不过是黄粱一梦，但她却愿意为了美好的未来而奋力一搏。然而，现实还是无情地打破了她的幻想，晚宴的落幕意味着伊莉莎顺利毕业，她即将结束六个月的“公爵夫人”的生活回归现实社会之中。实验结束后，整个别墅弥漫着轻松愉快的气息，息金斯对自己的聪明很得意，炫耀着自己的成功，同时也感到一种无比的解脱。息金斯和辟克林丝毫不顾及伊莉莎的感

受，仿佛她只是一件失去价值的物品。在宴会上大放异彩的伊莉莎回到温波街别墅后意识到自己的两难处境，她发现即使自己伪装得和上流阶层的贵族一模一样也难以真正地融入他们，不同阶层之间历史与文化带来的隔阂难以逾越和消除。她变得迷茫和失落，看不到自己的出路。她绝望地挣扎道：“我能干什么？你让我变成这个样子，还能干什么？我到哪里去？我干什么好？我将来怎么办？”^{[7]129}息金斯却带着上层阶级一贯的残忍和冷酷回答说：“我怎么知道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又算得了什么？”^{[7]128}伊莉莎猛然顿悟，原来在息金斯的眼中她从来都不是和他们平等的人，只不过是一个无聊的消遣和赌注，息金斯一直在理所当然地操纵、控制她，这对认为自己已经融入上流社会的伊莉莎来说是个无比沉重的打击。在这一刻，她的灵魂觉醒了，她不愿沦为上流社会的工具和玩物，于是撕下虚假的面具，开始找寻真实的自我。

（二）伊莉莎的理性逃脱

反抗与权力是共生的，“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会存在反抗的可能性”^[11]。当意识到自己处于被支配的他者地位之后，伊莉莎决定反抗上层阶级的权力，争夺自己对话语和身体的主导权。“言说既是权力的工具和效力，也是它的障碍和阻力，是它的反抗点及对立的战略形成的出发点”^[12]，话语不仅是权力的代表，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削弱或对抗权力。“萧伯纳的《卖花女》包含了话语中揭示的权力变化。”^[2]在街头卖花时，伊莉莎就不畏强权、敢于反抗，勇敢地争取自己的权利。在找到息金斯为自己授课时，伊莉莎也丝毫不因自己的地位低下而自卑，而是始终坚信人人平等。但是，在温波街别墅寄人篱下的这段时间，话语权一直牢牢地掌握在以息金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手中，伊莉莎不能随心所欲地说话，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从而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主体地位。然而，在最后一幕中，伊莉莎不再唯唯诺诺，而是勇敢地表达出了自己内心深处压抑已久的想法，但息金斯则一如既往地歇斯底里。“贵族资本家的自私、

势利、浮华、空虚和处于社会底层的卖花女的真实、善良、自尊、自立形成了强烈对比。”^[13]除了夺回话语权,伊莉莎还牢牢控制了对身体的主导权。她不再恭顺地为息金斯准备拖鞋,而是将代表着与过去决裂的决心的拖鞋扔向息金斯。下定决心逃离温波街别墅这座监狱后,伊莉莎留下礼服、珠宝首饰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连夜出走。掌握了身体的主导权后,伊莉莎遇到了倾慕自己已久的弗莱第,她勇敢地拥抱并且亲吻他,丝毫不在乎世俗的目光。经历了六个月的规训后,伊莉莎彻底改变了,言行举止、思想观念等各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她已经不可能再穿上肮脏的大衣回到贫民窟继续以卖花为生。她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那就是成为一位像息金斯一样的语音学教师。

伊莉莎自始至终都在努力地向上攀爬,想凭借自己的力量过上美好的生活。她没有妄想成为公爵夫人,只希望能成为一名花店店员,获得众人的尊重。可以看出,从一开始,伊莉莎就愿意自食其力,并努力把握机会、勇敢尝试。面对一次次的考验,伊莉莎总是集中全部精力进行战斗,最终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伊莉莎从未被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冲昏头脑,而是始终保持着理性和冷静。但息金斯到最后仍然是一副高高在上的资产阶级的丑恶嘴脸,在他的眼中,伊莉莎一直是那个地位卑微的穷苦卖花女。由于不能收获平等与关爱,伊莉莎毫不犹豫地与息金斯等人决裂,逃脱了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的规训和束缚,选择成为一个独立自主、自尊自爱、勇敢追梦的新女性。

四、结语

现代社会本质上是规训社会,资本主义父权制从根本上压抑着底层贫苦女性的生存和发展。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卖花女,在权力的控制下,伊莉莎受到了身体和话语的双重规训。她曾试图在全景敞视监狱中遵循上流社会的规范来改造自己,然而华丽的外表与简单的话语改变的只是冰山一角,并不能带来本质的颠覆,她最终还是无法打破阶层固化的壁垒,难以实现阶级跨越。因此,面对着赤裸裸的残酷现实,伊

莉莎最终觉醒了女性主体意识,凭借勇敢摆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与束缚,从悲剧的他者成长为独立的勇士,蜕变为一名新女性,获得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解放。萧伯纳通过《卖花女》这一针砭时弊的社会问题剧展现了英国 19 世纪末转型期复杂的社会问题,他强烈地抨击了英国社会腐朽的等级制度和上流社会的虚伪冷漠,表达了对贫苦大众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阐释了自己对于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

参考文献:

- [1] PIRNAJMUDDIN H, ARAIN F S. Discourse and power in George Bernard Shaw's *Pygmalion* [J].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2011, 3(3): 146–152.
- [2] KUHI D, HASSANIMEHR M.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Pygmalion* by George Bernard Shaw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2013, 2(5): 21–33.
- [3] 吕曰文. 身份的获得 自我的丧失:《卖花女》中伊莉莎的女性主体构建危机[J].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2019, 39(2): 48–53.
- [4] TAYLOR D. Michel Foucault: key concepts[M]. Durham: Acumen, 2011: 41.
- [5]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杨远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 [6] DANAHER G, SCHIRATO T, WEBB J. Understanding Foucault [M]. Sydney: Allen & Unwin, 2000: 26.
- [7] 乔治·伯纳德·萧. 萧伯纳戏剧选[M]. 潘家洵,老舍,杨宪益,等,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6.
- [8] BEAUVIOR S. The second sex [M]. Trans. PARSHLEY H M.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6: 273.
- [9] BUTLER J. Undoing gender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下转第 93 页)

“困难危重”或“洞见利机”分别着眼于“向坏”或“向好”形式,常体现出言者“担忧”或“乐观”的态度。

五、结语

副词作为虚词的一类,其意义往往隐晦而难以捉摸,因此要精确提取副词的语法意义和情态特征,就必须借助副词所处的话语关联、句子类型和同现成分这些外在“标记”对其进行定位,并从“选择”与“限制”两个角度验证其语法意义和情态内涵。

本文以语义语法理论为指导,按照从句法分布特点到话语关联再到语义情态的顺序,概括出副词“搞不好”的话语关联——“因情估果”,并正反验证副词“搞不好”的“担忧”或“乐观”情态。首先,从句类选择、句法位置、同现成分三个方面对副词“搞不好”的句法分布特点进行描写,归纳出其主要特点是“陈状未知”;其次,根据副词“搞不好”的逻辑和语义关联归纳并验证其话语关联为“因情估果”;最后,根据副词“搞不好”的句法分布验证其语法意义以及预估坏果的“担忧”之情或期盼愿果的“乐观”态度。至此,副词“搞不好”的句法分布特点、话语关联与语义情态基本得到了描写与验证,为了解副词“搞不好”提供了一条较为清晰的线索。

(上接第84页)

- [10] SCHWAN A, SHAPIRO S. How to read Foucault's *Discipline and Punish* [M]. London: Pluto Press, 2011.
- [11] 米歇尔·福柯.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 [M]. 严锋,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参考文献:

- [1] 张谊生.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 [2] 张杰. 揣测类评注性副词“搞不好”的用法及功能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 2019.
- [3] 胡斌彬. 由假设小句向认识情态标记的语法化:以“搞/弄/闹不好”为例[J]. 古汉语研究, 2016(3): 72-80.
- [4] 鹿钦佞.“搞(弄/闹)不好”的功能及其语法化[J]. 汉语学习, 2008(1): 37-44.
- [5] 王健慈. 汉语评判动词的语义类[J]. 中国语文, 1997(6): 432-438.
- [6] 刁晏斌. 现代汉语虚义动词研究[M]. 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7] 杨晓霖.“搞不好”的新义[J]. 现代语文, 2006(8): 109-110.
- [8] 邵敬敏. 现代汉语通论[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6:44.
- [9] 赵春利,杨娟. 遂愿副词“总算”的话语关联与情态结构[J]. 当代修辞学, 2021(5): 13-25.
- [10] 沈家煊.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4): 268-275.

(责任编辑:冯兆娜)

1997:47.

- [12] 米歇尔·福柯. 求知之志[M]//杜小真. 福柯集.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8:351.
- [13] 曲彬,尹丹.《卖花女》主人公伊莉莎的人物塑造[J]. 名作欣赏, 2019(6): 103-105.

(责任编辑:冯兆娜)